

盖世太保

第三帝国的统治和暴政

〔德〕米歇尔·斯托勒
卡斯滕·达姆斯 著
朱刘华 译

秘密国家警察作为“第三帝国”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迫害机构继续生活在回忆里。可这幅画像正确吗？本书在最新研究的基础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书中揭示了盖世太保的工作能力是多么依赖民众和国家行政机构的支持。这张迫害网络进入德国社会里的深度远远超过人们一九四五年之后想承认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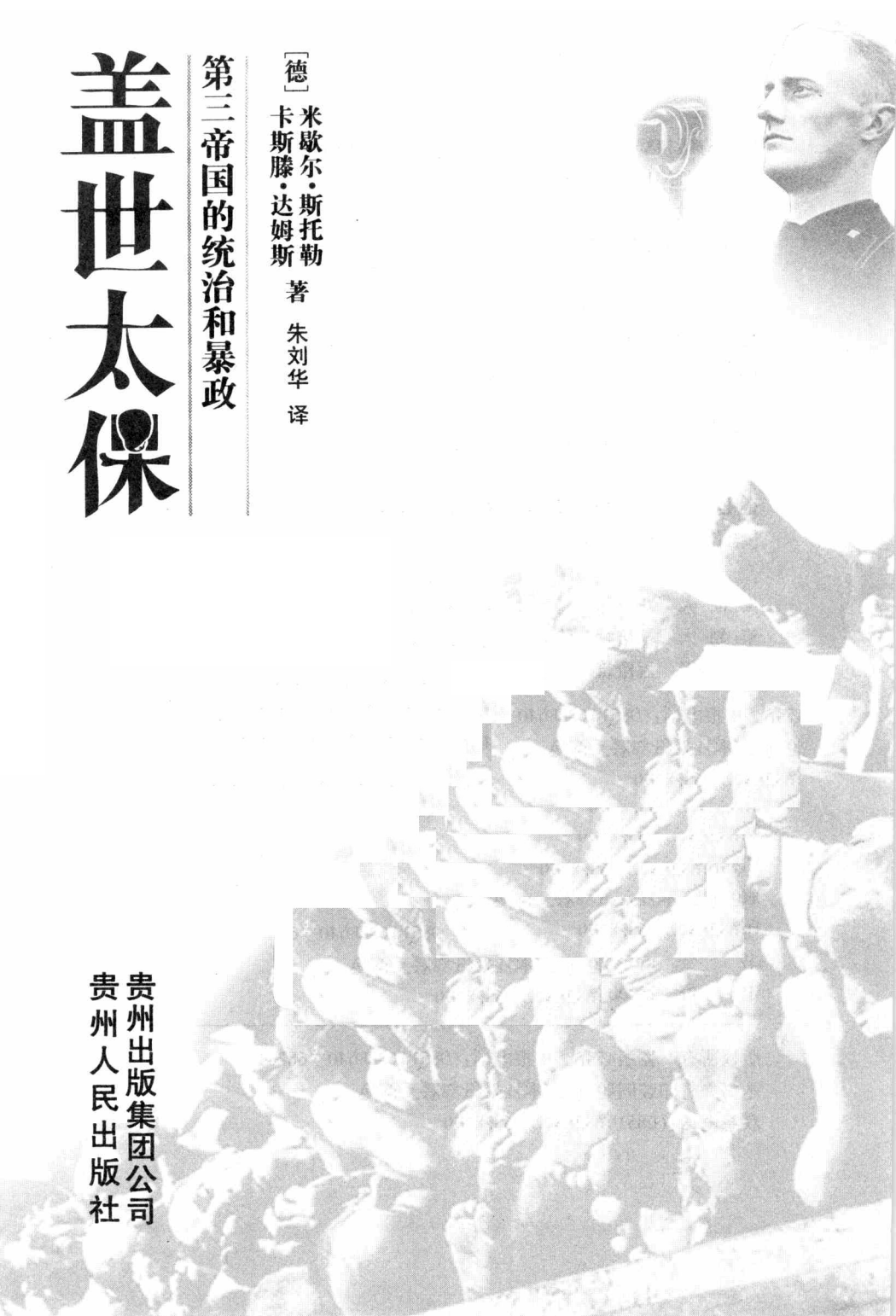
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贵州人民出版社

盖世太保

第三帝国的统治和暴政

〔德〕米歇尔·斯托勒
卡斯滕·达姆斯 著 朱刘华 译

贵州出版集团公司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州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22-2010-2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盖世太保——第三帝国的统治和暴政/(德)卡斯滕·达姆斯/米歇尔·斯托勒著;朱刘华译. --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221-09121-5

I. ①盖… II. ①卡…②朱… III. ①特务组织-史料-德国-1933~1945 IV. ①D751.6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6074 号

© Verlag C. H. Beck oHG, München 2009

盖世太保——第三帝国的统治和暴政

[德]卡斯滕·达姆斯/米歇尔·斯托勒著 朱刘华 译

出品人 曹维琼

策划人 杜培斌 陈继光

责任编辑 孟豫筑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址邮编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550001

印刷 贵阳德堡快速印务有限公司

规格 787×1092 毫米 1/32

字数 160 千

印张 7

版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1-09121-5

定价 25.00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851)6828640 6828477

本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851)6828477 6828390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成立和初期	(7)
前史:魏玛共和国的国家保安	(7)
盖世太保诞生	(10)
第二章 组织发展	(17)
“帝国化”:希姆莱和海德里希接手领导盖世太保	(17)
建立一个民族主义的警察:	
德国、被占国的警察和党卫队体系	(23)
盖世太保的自我认识和意识形态	(36)
第三章 盖世太保的工作人员	(40)
人事发展	(40)
盖世太保领导人:迪尔斯,海德里希,贝斯特,缪勒	(43)
盖世太保总部和帝国中央安全总局的领导人员	(50)
外省的地方长官	(54)
盖世太保官员的多样化	(59)
第四章 工作方式	(67)

目 录

框架条件	(67)
盖世太保的线人	(76)
告密的作用	(83)
与警察、党卫队和纳粹党组织合作	(94)
第五章 德国境内的迫害活动	(103)
迫害阶段	(103)
政治迫害: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	(107)
迫害宗教组织	(111)
实施犹太人政策	(116)
打击同性恋、“好逸恶劳者”和“社会危害分子”	(123)
迫害“外籍民族”	(125)
第六章 盖世太保在欧洲	(133)
“国外行动”的特征	(133)
扩张的开始:奥地利,苏台德地区和捷克斯洛伐克	(137)
波兰 1939 年:灭绝战争的开始	(141)
盖世太保在北欧和西欧	(152)
灭绝行动的升级:盖世太保在东南欧和东欧	(160)
战争后半期的任务地区:	
非洲、意大利、匈牙利、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	(171)
废墟里的极端化;“国外任务”的反作用	(176)
第七章 1945 年后的盖世太保	(181)
自杀,逃跑,迫害:从战争结束到纽伦堡审判	(181)

目 录

法庭诉讼程序和去纳粹化	(186)
德国法庭追究刑事责任	(189)
在战后德国的飞黄腾达	(199)
结束语	(206)
盖世太保留下了什么?	(206)
人名索引	(210)



引言

秘密国家警察——简称盖世太保——代表“第三帝国”在德国和欧洲的纳粹统治和暴政。它是纳粹国家的中央行政机构，具有深远的权限。盖世太保领导人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早在1941年德意志警察节时就曾经满意地强调，同时代人是以一种“畏惧和害怕的复杂感情”看待盖世太保。德意志警察节是一场为纳粹国家的警察工作做广告的宣传活动。盖世太保也趁此机会展示了自己，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不无满足地宣布，它“被政治侦探小说窃窃私语的秘密所包围”。

而秘密国家警察绝不秘密：被强行一体化的媒体早就公开了它的方法。纳粹国家的每一位“对手”都应该清楚，如果他不适应新情况，他就要与谁打交道。盖世太保也不用一道沉默的面纱遮掩它的人员。任何人只要想知道，都可以从众多的官方日程或绝不秘密的工龄表格里查阅谁是它的主管官员。是的，盖世太保甚至触手可及。在德意志警察节那天，也有盖世太保官员站在街角，参加寒冬赈济组织的募捐运动。海德里希曾经说：“开玩笑地讲，我们是变化的，从‘负责一切的女仆’到‘帝国垃圾桶’。”^①这话虽然有点讽刺意味，但谈到了包围盖世太保的

^①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警察里的政治士兵制度》，收录于《民族观察家》，1941年2月17日。

全知全能的光环。

如何接近这么一种被神话包围、貌似全能的机构呢？看看盖世太保的组织 and 人员，其令人难以置信的威力很快就会引起注意：盖世太保短短几年内将它的人员数量翻了几倍，人数一直在变化不停。它的组织结构也一直在改变。这并不表示计划不充分，而是一个有意识的决定。因为，1937 年，后来的盖世太保不来梅分局局长阿尔弗雷德·施韦德尔就在他的司法论文中介绍，“只有一支威力很大的警察队伍才能满足”纳粹国家的需求。^① 盖世太保的任务也在变化和增大，最初盖世太保仅在德国境内活动，后来是在整个欧洲。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警察的业务也不同。在纳粹国家的许多机构都可以观看到变化过程，而对于盖世太保不断变化，或更准确地说，适应过程成了它的性格特征。换句话说，1933 年的盖世太保不同于 1936 年、1939 年、1942 年或 1945 年的盖世太保。

另一个显著特点是盖世太保同党卫队的密切联系。弗朗茨·瑙曼是一位德国律师和流亡者，1944 年，在介绍过盖世太保及其原则上没有限制的权限之后，就在他的划时代作品《巨兽》里得出结论：“这就是德国的警察系统，它的灵魂在党卫队。”^② 党卫队同盖世太保一样，要远比纳粹党的其他所有组织同纳粹暴政更多地纠缠在一起。盖世太保和党卫队的共生也体现在它们的领导人身上：海因里希·希姆莱同时担任“党卫军帝国领袖

① 阿尔弗雷德·施韦德尔：《政治警察——梅特涅系统、魏玛共和国和纳粹国家政治警察的本质和理由》，法学论文。柏林，1937 年，第 164 页。

② 弗朗茨·瑙曼：《巨兽——纳粹的结构和实践 1933 年—1944 年》，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2004 年第 5 版（初版于 1944 页），第 578 页。



兼德意志警察负责人”；莱因哈德·海德里希领导着帝国中央安全局,这是一个将盖世太保和刑事警察的国家组织与纳粹党自己的党卫队保安处结合在一起的机构。盖世太保的成员有的来自警察,有的属于纳粹党,这一不同隶属关系的结合也让当事人的责任含混不清——并不能始终分清是谁做了什么事,是一位盖世太保、刑事警察还是一位保安队员。尽管这个问题对迫害的牺牲者无关紧要,必须纠正到底谁、或什么是盖世太保的想法,因为秘密国家警察要大于名义上划归它的全体人员。

恩斯特·弗伦克尔是另一位逃出德国的法学家,早在1941年就推出了《双重国家》一书,他在分析中将国家分成标准国家和措施国家,它们在“第三帝国”并存并保持着各自的特殊形式,相互结合在一起。在标准国家,规定和法律适用于未受迫害的多数人口。相反,在措施国家,可以对被定义为敌人的人群实施凶残的暴政和赤裸裸的独裁,不用承担法律责任。弗伦克尔认为,盖世太保获得了“抽走标准国家职责范围内的整个生活领域,转让给措施国家”的权力。^①换言之,盖世太保是纳粹措施国家的专门机构。

最新的盖世太保研究宣布,盖世太保在“国家警察实践”中的成功主要是建立在群众主动告密支持迫害的基础之上的,实际上是告密才让迫害成为可能,这一论点在过去几年引起了很大关注,也包括传媒的关注。虽然流行的告密肯定对成千上万的纳粹国家受害者的不幸起了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国家和政党有组织的单位和机构的积极参与。从普通党卫队员到街区负责

^① 恩斯特·弗伦克尔:《双重国家》,汉堡2001年(初版于1941年),第83页。

人,从保安警察到农村警官直至行政秘书和信使,一旦或只要他们积极帮助迫害“第三帝国”早被打上烙印的少数派,他们在行为时就都是盖世太保的一部分。韦尔纳·贝斯特是安全警察和保安处的首席思想家,他的风头出得很不光彩,根据他的一句名言,盖世太保应该是“德意志民族躯体的医生”,他得到允许、接到命令,根除这个身躯的疾病——纳粹政权的政治、尤其是种族“敌人”很快就被视为这种疾病了。没有哪位医生没有助手、没有什么手术、没有医院:谁想理解盖世太保的工作方式,就无法不考虑这个自荐“医生”的基本设施。在被占领的欧洲,自然而然会将视野扩大到臆想的大屠杀的核心部队周围。参与大屠杀的作案群体太复杂、太多,参与犯罪的机构交织太深。在这个集合体里很难将盖世太保视作独立机构。而它在帝国境内也是以网络方式运作的,将来应该多关注这一点。

1945年后,盖世太保迅速成为一个幻灯屏:纳粹的所有暴行都被选择性地归罪于盖世太保或党卫队。而迫害和灭绝网络的真实规模却被渐渐隐去了。于是,较长时间,无论德国国防军还是“普通”警察都不在刑法制裁的焦点,为数百万士兵、警察、行政工作人员和“普通”纳粹分子融入年轻西德的民主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减轻了负担。历史研究一开始也遵循这一基调,将盖世太保看作一个万能的秘密警察;这一视角直到90年代才发生变化。盖世太保的形象现在变成了一种恰恰是弱小的政治警察。我们相信,尽管存在许多必要的纠正,这一点迄今都被夸张了,盖世太保绝非全知全能,但它仍然是一个有效的暴政工具,它同其他工具一道屠杀了数百万人。

我们不想以本书进行全面的介绍,阐述所有的方方面面。



那样的话无论是规模还是细节都必须多出好多倍。我们只想依据作者自己的研究和如今可观的科学调查数据做一个简短的概括介绍。^① 我们的目的是用这一综合来填充撰写历史的一个漏洞。在这之前谁想了解盖世太保,就必须查阅不完整、陈旧或追求轰动效应的介绍,或通过不断增加的科研文献独立工作。^②

前两章将介绍盖世太保的成立、组织发展和对自己地位的认识,将它们同国家警察的实践活动密切结合在一起研究。相反,第三章的重点是活动家,从领导层开始,到不同的指挥人员直到普通警察,介绍了所有的人员群体。第四章是借助一个个例子介绍盖世太保具体的工作方法。除了普遍适用的框架条件之外,先是提炼出了线人与人员和告密的作用。但是,对于盖世太保的成功,随后介绍的与其他警察和纳粹党机构的合作更重要。还有,迫害的工作分工是盖世太保、乃至整个纳粹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

第五章探讨德意志帝国及其不同阶段的迫害活动。以被迫害的群体为中心。被盖世太保盯上的先是纳粹政权的政敌,主要是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纳粹党在教会和宗教里的敌人同样被盖世太保推翻了。它在迫害犹太人时也起了主要作用。

① 卡斯滕·达姆斯:《魏玛共和国的国家保安——1928年-1932年普鲁士政治警察对纳粹党的监视和打击》,马堡,2002年;米歇尔·斯托勒:《巴登秘密国家警察——第三帝国一个地方迫害机构的人员、组织、作用和影响》,康斯坦茨,2001年。参见:格哈德·保尔/克劳斯-米歇埃尔·马尔曼(编选出版):《盖世太保的神话和真相》,达姆施达特,1995年;格哈德·保尔/克劳斯-米歇尔·马尔曼(编选出版):《二次大战中的盖世太保——“后方”和被占的欧洲》,达姆施达特,2000年。

② 诸如:爱德华·克兰克肖:《盖世太保》,伦敦,1956年;雅克·德拉鲁:《盖世太保史》,杜塞尔多夫,1964年;约亨·封·朗格:《盖世太保——暴政的工具》,汉堡,1990年;弗兰克·古特默特/阿尔诺·奈茨邦特:《盖世太保》,柏林,2005年。

引 言

另外,同性恋者及所谓的“好逸恶劳者”和“社会危害分子”遭到迫害,表明秘密国家警察全面的监视权力。这一章结束于对“外来民族”劳工的监督一节,在战争的最后几年这成了“后方”的主要任务。

在第六章跟踪了盖世太保在整个欧洲留下的血迹。从波兰至北欧、西欧,直至东南欧和东欧,它留下一条谋杀的线索。在大屠杀的启动和实施上,盖世太保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欧洲采用的办法,大约自 1944 年年中起也用在了德国本土、灭绝的能量最终回到了原先释放它的国土。

在最后的第七部分介绍了盖世太保的后史:凶犯们结局如何,他们被追究了怎样的刑事责任?他们成功地融入了战后社会吗?他们又是以什么方式发迹的?最后结束于我们以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开始的地方——作为神话和隐喻的盖世太保。



第一章 成立和初期

前史：魏玛共和国的国家保安

1931年3月，纳粹党柏林大区负责人约瑟夫·戈林在他的日记里写道：“警察十分严厉。几乎都不能咳嗽。”^①尤其是普鲁士政治警察的措施对戈林影响很大：他出版的《进攻》报从1930年11月至1932年7月共被短期禁止19次。经济损失相当大，多种纳粹报刊由于这种禁止不得不申请破产。戈林本人和另外80多名纳粹著名演说家在普鲁士被有限期地禁止演讲。纳粹党的情报机构也遭到严格监视，这同样让戈林痛苦万分，他经常抱怨密探成灾。^②

监视和监督掌握的信息量很大，包括得出的结论，早在1939年5月的一封备忘录中就这样写道：“另外，党参与执政从而影响政府部门人员具有很大的危险，甚至利用国家的帮助来从事和促进国家及其权力工具的瓦解。可是，一旦国家社会主义者实现了它所追求的这一近期目标，实施他们的第二目标的道路

① 约瑟夫·戈培尔：《约瑟夫·戈培尔日记全集》，由埃尔克·弗吕利希编选出版，1924年-1941年日记第一部分，慕尼黑等地，1987年，第二册，第40页。

② 达姆斯：《国家保安》，第67-119页。

第一章 成立和初期

就很短了：以暴力工具夺取国家权力，建立纳粹专制形式的‘第三帝国’，它的内外政策都具有同样有害的破坏作用。”^①

这一分析清楚表明，普鲁士政治警察清楚地认识到了纳粹党的危害。在其他州，政治警察很大程度上也表现得能胜任他们的任务，尤其在情报方面更是消息灵通，比如在巴登。^②而在普鲁士，国家保安积极对付纳粹分子。魏玛共和国不是手无寸铁，与今天的许多看法相反，存在坚决反对纳粹党的法律基础。^③从事国家保安任务的机构传统上自称政治警察。另外，除了情报机构考查和打击极右和极左派别，它本身的任务还包括反谍报活动。换句话说，今天负责宪法保护的各州局和联邦局的任务，当时是由警察完成。

1930年，普鲁士约有1000名政治警察。当时普鲁士共有44个警察局，政治警察为行政警察一处。柏林的政治警察有员工300名，在亚琛、多特蒙德和基尔等其他大城市分别只有12人。^④他们多为接受过培训的刑事警察，大多数是主动申请从事这一工作的。总体说来普鲁士的政治警察是一个相当忠诚的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工具，这体现在它对德国共产党和纳粹党一视同仁，予以监视和打击。反正普鲁士警察的右眼不瞎。尽管如此，我们还将看到，它后来很大程度上听任新的掌权者操纵。

① 备忘录《纳粹德国工人党》，收录于《国家和纳粹党——1930年—1932年》。布吕宁时代的资料，由格哈德·舒尔茨作序，艾尔莎·毛勒和乌多·温斯特整理，杜塞尔多夫，1977年，第75页以下。

② 斯托勒：《秘密国家警察》，第46页。

③ 克利斯托夫·古西：《魏玛——手无寸铁的共和国？魏玛共和国的宪法保护和宪法保护》，蒂宾根，1991年。

④ 达姆斯：《国家保护》，第53—66页。



在普鲁士之外,无论是人员还是组织上,盖世太保都以更厉害的方式从各州的政治警察中招兵买马。巴伐利亚在此起着特别的作用:在这里,早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同右倾激进组织有纠缠、在魏玛共和国初期支持政治谋杀的官员就占主导地位。^①后来他们同崛起的纳粹运动的斗争也很不够,这一事实与普鲁士的坚决表现存在明显的差别。另外,在德国较小的联邦州,警察局根本没有设立专门的政治部门,比如在奥尔登堡。^②相反,在其他州,纳粹党早在“夺取政权”之前就进入了政府负责部门,从而可以对警方施加影响,比如威廉·弗利克,他从1930年起就担任图林根内务部长。因此,仔细观察魏玛共和国的国家保安,各州的成果区别很大。这要归咎于传统上是联邦制特征的德国警察体制。因此,到处都能成功转变为一个最初是地方性组织的国家秘密警察,就更叫人吃惊了。

在普鲁士,早在魏玛共和国时就停止反对纳粹党了,1922年7月20日,普鲁士政府被国家总理弗朗茨·封·巴本以政变的方式推翻了。巴本政变的直接后果是11名警察局长及无数其他的政治警察被撤职,包括柏林警察局长阿尔贝特·格尔泽辛斯基,他的副手伯恩哈德·魏斯和普鲁士内务部国务秘书威廉·阿贝格。不过,这一措施涉及的只有政治领导层,普通警察未被开除。总体说来,1932年7月20日警察机构里的“普鲁士

① 马丁·法茨:《从国家保安到盖世太保暴政——魏玛共和国末期和纳粹专政初期巴伐利亚的政治警察》,维尔茨堡,1995年,第144页;詹姆斯·麦克盖:《巴伐利亚的政治警察》,论文,佛罗里达大学,1980年,第278页。

② 《奥尔登堡盖世太保报告……自由公国和奥尔登堡州秘密国家警察和内政部长的报告》,由阿尔布莱希特·艾克哈特和卡特琳·霍夫曼整理作序,汉诺威,2002年,第17页。

第一章 成立和初期

打击”仍是通向“第三帝国”道路上的关键性突破。

柏林政治警察内部还发生了其他人事变动:坚定的共和党人虽然未被开除,但被调去了行政警察或刑事警察,代之以政治上更可靠的警察。他们一开始不是纳粹分子。但1932年秋天还是有个别警察接近纳粹党,建立了最早的联系。政治警察的实际工作中也出现了明显的风格转变:1932年夏天,同“信仰犹太教的德国公民中央组织”的合作被停止了,对纳粹党的监视被降到最低限度。同时,普鲁士政治警察的措施涉及的几乎只有共产党人,现在再加上社会民主党人。这样,早在“夺取政权”之前,纳粹党就为通过盖世太保打击对手进行了重要的准备工作。^①

盖世太保诞生

1933年1月30日后,取得对警察机构的控制,这对纳粹分子具有重要的意义。可是,由于各州条件不一,这一夺权阶段不是到处都同步发生的。由于面积大、人口多及警察队伍的强大,普鲁士就具有突出的意义。于是,纳粹分子的策略是这样的:除了担任帝国总理的阿道夫·希特勒和担任帝国内务部长的威廉·弗利克,赫尔曼·戈林是帝国政府里第三个纳粹分子。虽然作为帝国部长他的级别较低,但作为负责普鲁士内务部的帝国专员,戈林在纳粹夺权的过程中实际上起着主要作用,他控制

^① 克利斯托夫·格拉夫:《民主和专制之间的政治警察——普鲁士政治警察从魏玛共和国的国家保安机构到第三帝国秘密国家警察的发展》,柏林1983年,第90页。



着整个普鲁士的警察机构。戈林努力将普鲁士警察变成一个言听计从的权力工具,用它来毫无顾忌地打击国内政敌。

早在1933年1月30日戈林就下令控制所有共产党干部,遇到合适的机会就逮捕他们。为此可以动用魏玛共和国政治警察包罗万象的材料,无论是对纳粹党还是对共产党,魏玛共和国的政治警察都特别信息灵通。继续大力改组政治警察,将它从共和的国家保安工具变成纳粹工具,就像让穿制服的保安警察一体化一样。研究报告长期都认为纳粹在警察内部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清洗”,他们可是夸夸其谈、直着嗓子这么宣布过。但较新的研究报告却表明偶尔也有很高的人事连续性。普鲁士的实际情况到底怎样呢?截止1934年2月1日,虽然有1000多名官员被开除出了整个警察队伍,但这个比例相比较而言很小:保安警察军官占7.3%,军士占1.7%。刑事警察内部为1.5%——但在较高职位上超过10%。^①

政治警察内部又是另一番情形:虽然也没有大量开除,但有许多人被调动,总体看来有明显的人事改组。先是民主倾向明显的警察被开除。涉及的大多是担任领导职务的中层官员,比如约翰尼斯·施图姆,极右党派的总监,1945年之后他成了西柏林的警察局长。还有波鸿、杜伊斯堡和法兰克福的政治警察行政机构负责人都丢掉了他们的官职。在“夺取政权”整整两年之后,普鲁士政治警察的59位有名有姓的中层官员中有14人被开除,28人被调往刑事警察,11人被盖世太保接受,4人被派去

^① 卡斯滕·达姆斯:《连续性和断裂——普鲁士高级刑事警察从魏玛共和国到纳粹的过渡》,柏林,1983年,第90页。